



阜
阳

历
史

文
化

丛
书

杨
新
主
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阜阳市委员会

编



阜阳汉代铜镜研究

杨玉彬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阜阳

历史

文化

丛书

杨新◎主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阜阳市委员会

一编

阜阳汉代铜镜研究

杨玉彬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阜阳汉代铜镜研究/杨玉彬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6
(阜阳历史文化丛书/杨新主编)

ISBN 978-7-5650-3384-1

I. ①阜… II. ①杨… III. ①古镜—铜器(考古)—阜阳—汉代
IV. ①K87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6992 号

阜阳汉代铜镜研究

杨玉彬 著

责任编辑 张 慧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次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690 毫米×980 毫米 1/16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 张	17.75 彩插 0.5 印张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 数	404 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3384-1

定价: 56.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阜阳市委员会

《阜阳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任 李志伟 亓 龙 耿 玲

副主任 李 进 王振军 杨 新

主 编 杨 新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华 王秋生 刘 宏 刘敬堂

张开华 张明华 张新伟 李良玉

杨 新 杨玉彬 杨世新 胡天生

梁家贵 韩自强



西汉“大乐贵富”铭蟠螭纹镜
铭文：大乐贵富，千秋万岁，宜酒食（鱼形标记）。



西汉“上大山，见神人”铭博局纹镜
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央（英），饮澧（醴）泉。驾文（交，蛟）龙，乘浮云。



新莽西王母禽兽博局纹镜



新莽“泰（漆，七）言之纪”铭禽兽博局纹镜
铭文：泰言之纪从镜始，青（龙）在左，白虎在右。



新莽“井田”铭禽兽博局纹镜

铭文：刘氏去，王氏持，天下安宁。井田平，贫广其志。



新莽“新兴辟雍”铭禽兽博局纹镜

铭文：新兴辟雍建明堂，然（单）于举土列侯王，
将军令尹民户行，诸生万舍在北方，子孙复具治中央。



东汉“汉有善铜出丹阳”铭禽兽博局纹镜
铭文：汉有善铜出丹阳，和以银锡。



东汉“升仙图”画像镜
铭文：蔡氏作竟真大巧，上有山人不知老，
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四海，寿比涌乔。

序 言

阜阳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淮颍之水，滔滔汨汨，绵延不绝；上自殷末，下迄当代，其间名家辈出，光照千古；形式多样，异彩纷呈；艺术魅力，经久不衰。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就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把天下分为九州，今天的阜阳隶属豫州。商朝成汤建都于亳，阜阳地近商都，社会经济文化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西周时期，阜阳是胡子国的国都。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期，各国变法图强，弱肉强食，小国被迫依附大国。春秋后期，阜阳境内的小国基本上为楚国兼并，称为汝阴（即小汝水之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地方上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阜阳置汝阴县，隶属泗水郡。汉承秦制，阜阳仍为汝阴县。公元108年，汉安帝封刘显为阜阳侯，其封地虽不在今天的阜阳市，但阜阳地名开始出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战事频繁，尤其是淮河一带，政权更替，属地交错，建制比较混乱，但总体上看，当时的阜阳属于豫州。隋唐时，阜阳设汝阴郡（后曾改为颍州）。北宋时，开始实行路、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当时在阜阳境内设置了顺昌府（治今阜阳市）。金代设颍州，元朝创设了行省制度，当时阜阳称为颍州，属河南江北行省。明朝在今阜阳境内设置颍州。清朝雍正帝时，阜阳升州为府，取名颍州府。民国时期，在阜阳设置行政专员督察区（简称“专区”），作为安徽省政府的派出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设立了阜阳专员公署（驻今阜阳市），1996年阜阳撤地设市，当时辖太和、界首、涡阳、蒙城、利辛、颍上、阜南、临泉，以及颍州、颍泉和颍东三区，并代管亳州市、界首市。1998年亳州成为计划单列市。2000年，亳州成为省辖市，涡阳、蒙城、利辛三县划归亳州管辖。目前，阜阳市辖三区、四县并代管界首市。

阜阳史前文化位于山东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这里曾创造

过黄河文明，更是淮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大约 5000 年前，这里的人们已经开始摆脱逐水而居的境况，在颍河、小汝水（今泉河）沿河台地上定居下来，并形成以农业为主的原始部落，创造出辉煌的古代文化，留下了许多古文化遗址，如临泉吕寨境内的官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的遗存，距今约 7000 年，临泉境内的九槐遗址、台阳寺遗址、老丘堆遗址、胡台遗址、费子街遗址，太和县倪邱遗址、灰角寺遗址，阜南县的丁王庄遗址、地理城遗址、清凉寺遗址等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历史遗存。阜阳境内还发现龙山文化遗存 20 多处，原始农业、手工业和艺术都有相当成就。阜阳境内的商周文化遗存，以陶器、青铜器为主，润河沿岸的阜南朱寨润河湾、颍上王岗郑小庄出土的青铜器以铸造工艺精湛、纹饰华美著称，阜南县朱寨海孜村常白庄润河湾 1957 年 6 月出土的龙虎尊青铜器，造型独特，端庄凝重，意蕴深长，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阜阳出土的青铜器还有商代酒器“酉”字爵，战国勾杀兵器大梁司寇绥戈、王莽铜镜等。秦汉以来，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势力，在墓前雕刻一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动物象征守卫，石雕天禄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此件石器出土于临泉县境内，是国家一级文物。白底黑花釉虎形枕出土于太和县境内，现藏阜阳市博物馆，是宋代磁州窑出产的产品。瓷枕的整个画面生动活泼，不落俗套，造型优美，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民间色彩。阜阳城西南郊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竹简、阜阳城西郊出土的古代玉器精品——蜻蜓眼玻璃珠、界首市光武出土的“大泉五十”钱母（古代铸钱的模具）等更具学术研究价值。阜阳竹简是西汉初期的简册，1977 年在阜阳城西南的汝阴侯墓中发掘出土。这批被文物考古学界誉为稀世之宝的阜阳竹简，其珍贵之处在于：第一，简书种类多。阜阳竹简包括十多种古代典籍，书种繁多，而且内容包罗万象。按我国传统的图书分类，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就内容而言，则医药卫生、童蒙教育、天文计算、星相卜卦、天干地支、行气养生、建筑工程、器物制造、农产品加工、相狗术等无所不涉，在国内汉简发掘史上实属罕见。第二，史料价值高。在阜阳竹简所存的典籍中，有些属首次发现，为史籍所未载；有些即使有今本存在，但字句多有不同。第三，书法精湛。在国内历年出土的竹简中，阜阳竹简书法是被专家公认最为优美的一种。阜阳简文字墨书，且各种书籍字体各不相同。有的温文清秀，有的粗犷奇崛，有的飘逸俊美，有的严谨端庄，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这些资料对于考察秦汉时期的历史、语言、文字，研究历代书法艺术的发展源流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目前，阜阳市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古代墓群女郎台也正在考古发掘之中。

阜阳人文荟萃，艺术繁盛。历史对阜阳情有独钟，在这里留下了浓墨重彩。阜阳自古就有“土风备于南北，人物推于古今”的美誉，孕育了姜子牙、管仲、鲍叔牙、甘罗、吕蒙、吕霞光、常任侠、戴厚英、刘德培等闪烁古今、蜚声四海的名人贤士；漫长的历史长河给阜阳留下了颍州西湖、文峰塔、魁星楼、刘锜庙、管鲍祠等丰富的人文景观。唐宋时期的文坛巨子晏殊、欧阳修、苏轼先后在颍州任职，都与钟灵毓秀的颍州西湖结下不解之缘。他们钟爱西湖，疏浚西湖，广植花树菱荷，增益亭阁堂台，更以他们独有的视角去发掘和审视颍州西湖的美，把它凝于笔端，挥洒于尺素，写下一首首、一曲曲颍州西湖的千古绝唱，也留下了颍州西湖余韵悠远的人文景观。欧阳修对西湖更情有独钟，“筑室买田清颖尾”“独结茅庐颍水西”“西湖烟水如我家”“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直至仙逝于老西湖湖心洲。历史上的颍州西湖曾与杭州西湖难分伯仲。宋代诗人杨万里说：“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汝颖与罗浮”，汝颖即是指今天的阜阳。宋代大文豪苏轼更感叹曰：“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颖谁雌雄。”明代《正德颍州志》载：“西湖长十里，广三里，相传古时水深莫测，广袤相齐。”《大清一统志》云：“颍州西湖名闻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古今称颂颍州西湖风景之美的诗篇多达 259 篇。南宋时，抗金名将刘锜在此地大破金兵，取得重大胜利。元朝末年，刘福通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红巾军起义。1928 年 4 月 9 日，在以优秀共产党员和宣传活动家、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为首的皖北特委领导下，阜阳爆发了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四·九起义”，为阜阳革命历史增添了新的光彩。

阜阳剪纸、颍上花鼓灯等 8 项文化遗产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6 项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阳民歌感情朴实，曲调流畅，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淮北特色。曾经广为流传的有《逃荒》《摘石榴》《十大绣》《看戏》《货郎子调》《李玉莲》等。乐器有班鼓、边鼓、手板、大锣、小锣、小镲、大镲、架排云锣、班笛、小喇叭等，音乐豪爽奔放，善于表现喜乐欢腾的情绪。阜阳在安徽省享有“曲艺之乡”的美誉。源于或流散于全市的曲种有淮词、清音、莺歌柳、琴书、坠子、道情、大鼓、评书、三弦书、端公戏、灶书、莲花落、杠天神、讲圣谕、相声、大小钹等近 20 种。阜阳民间舞蹈有 40 多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强烈的地域特色，其中花鼓灯舞蹈已蜚声海内外，自立于世界舞蹈之林而别具风姿。阜阳的传统庙会和民间灯会也是一条色彩斑斓的群众文化活动风景线。传统庙会除开展大型民间商贸活动外，也利用庙会唱大戏、演杂技、说曲艺、玩杂耍等。阜阳有名的灯会有界首灯会、颍州灯会、沙河灯会等，颇

受群众欢迎。淮北梆子本称梆剧，又称高梆、土梆。其源系秦腔传入阜阳后吸取当地流行的坠子嗡、灶王戏及民歌小调，逐渐衍化成具有淮北地方特色的梆子剧种。阜阳教育、科技、学术、宗教、民俗、工艺独具特色，在全国和黄淮海流域都具有较大影响。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阜阳厚重的历史文化，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鉴史明得失、育人爱热土、凝心开民智、聚力兴大业，可以牢记历史责任、强化对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文化新辉煌，促进文化大繁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为全面总结、准确反映阜阳有史以来的灿烂文化，探讨文化事业发展规律，给全市人民提供一套科学、规范的文史典籍，为阜阳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奠定坚实基础，根据市政协领导安排，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组织我市（包括阜阳师范学院）有关学者、教授20余人多次进行研讨、论证，确定从阜阳文学、文物考古、艺术、民风民俗、当代人物等方面入手进行整理、编撰，出版《阜阳历史文化丛书》。在近五年的编写过程中，许多专家、学者为此倾注大量心血和汗水，他们不畏艰难、无私奉献、殚精竭虑、严谨治学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感动，他们在阜阳历史上也将留下璀璨的一页。

《阜阳汉代铜镜研究》作者杨玉彬同志现任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曾参与清华大学课题“汉镜文化研究”（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项目2012WKZD005），撰写汉镜神话研究部分，已结项。《汉镜文化研究》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出版。他是国家级重大课题《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的主要编纂者，发表《汉镜图像校释》（《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第七辑，中国艺术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合办）、《安徽涡阳出土的东周青铜器》（《考古》2006年第九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办）、《安徽涡阳嵇山汉代崖墓》（《文物》2003年第九期，国家文物局办）等一批与阜阳文物考古研究相关的重要论文，此外还在《文物研究》《文物世界》《南方文物》《文物鉴定》《文博》《收藏家》《中国汉画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

《阜阳汉代铜镜研究》共40多万字，分概论、图像汇释、镜铭考证、综合研究四部分，介绍阜阳汉镜形制与图像、铭文特征，梳理其兴衰演变

轨迹，阐释铜镜铭文、图像所反映的重要史实等，力求通过铜镜材料的深度发掘来“复原”阜阳汉代特定的社会生活面貌与思想文化特征。本书对了解皖北地区汉代政治制度变迁、经济政策调整、手工业发展状况、文化艺术成就、社会生活习俗、时代艺术风尚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组织编写《阜阳历史文化丛书》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创新性的工作，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搜集、占有的资料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对一些专题虽然组织专家多次讨论、论证、审稿、核稿，但我们始终强调文责自负，仍以编著者本人的思想观点和编写体例为主，这些观点和思想成果是作者的一家之言，难免有偏颇和不足之处，欢迎广大文史爱好者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提出批评指正，以利再版时加以修正。在丛书编写过程中，编著者充分借鉴了相关的资料和作品，在此我们对相关著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阜阳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著名文史专家李兴武先生，阜阳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著名文学评论家陆志成先生，阜阳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阜阳市博物馆副馆长、考古专家杨玉彬先生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审稿、核稿，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还对丛书编著出版过程中提供热情帮助的相关领导和专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杨 新

2016年10月8日

序

玉彬新作《阜阳汉代铜镜研究》一书出版之际，嘱我为其作序，盛情之下，实难推辞。而一旦答应下来，反复推敲，面对皇皇四十余万言书稿，仔细思量，此序并不易写好，更遑论写出点眉目、道出点精彩来了。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阜阳汉代铜镜研究》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专著。中国的青铜器研究，自古以来就是由少数人掌握的一门高深学问。而铜器中的铜镜，更是众多青铜器分支中的一种，是青铜器家族中传世数量颇多而又独具特色的重要一员。除了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博物馆馆藏铜镜外，民间收藏家手中虽有一定数量，但大部分仅限于把玩和欣赏，知之者、研究者少之又少，正所谓“术业有专攻”，深究者、精通者更是凤毛麟角、鲜见其人了。

其次，《阜阳汉代铜镜研究》又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专著。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上下五千年，原始先民茹毛饮血，人们没有“镜”的概念。进入青铜器时代，人类文明告别了仅仅依靠石与火的生活。“铜”与“铁”的使用，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铜镜便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并迎来了三个发展高峰，就是战国铜镜、汉代铜镜和唐镜。何谓之“镜”？《说文解字》曰：“镜，从金，景也。”段注：“景者，光也。金有光可照物，谓之镜。镜亦曰鉴。”就是说，镜从金，是铜做的；镜即景，景有光，光可照物，就是镜子的来源。镜最初的功能是单一的，就是“照物”，主要是照“人物”，所谓“木兰当户织，对镜贴花黄”描述的即是此类场景，后来，慢慢赋予镜社会功能。在人们日久天长的世俗生活中，镜无处不在，诸如明镜高悬、照妖辟邪、祈福求安、吉祥祝寿等，寄托世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再后来镜亦曰鉴，镜、鉴一体，被赋予明确的政治功能，最著名的就是唐太宗三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到了北宋，司马光更是把中国历史浓缩

为一部《资治通鉴》，告诉当政者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该怎么做，以至于“殷鉴不远”不仅成为历代治世名君的座右铭，而且成为一般老百姓借鉴往事的口头禅。

再次，《阜阳汉代铜镜研究》还是一部知识性、系统性、创新性很强的专著。关于知识性，首先是涉及两汉社会的历史文化知识，从汉初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到武帝时期的抗击匈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穷兵黩武，再到西汉晚期的外戚弄权专政、豪强兼并土地、自然灾害频发、社会危机四伏，直到新莽改制、东汉中兴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历史风云画卷，通过一枚枚出土铜镜，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其次是“以镜证史”，发挥了小小铜镜可以印证、校证《汉书》的历史功效，成为该书的最大亮点。如对于阜阳出土的新莽镜“井田平贫”铭的研究，铜镜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汉镜文化研究课题组组长、清华大学顾问教授王刚怀先生评价指出：汉代谣言的大量出现与广泛流播，是我国古代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现象对社会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为后世所罕见。汉初除暴秦“禁言”之弊，继而形成了宽松的政治环境，统治者以“举谣言”“观采风谣”来考察官吏，并检讨自己为政之好恶得失，以及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原因，为谣谚参政议政、褒贬吏治、反映民众疾苦、素描社会百态等创造了条件。“井田平贫”铭博局镜即系其中精彩的一例，记载了王莽“复古改制”的梦想。再次是“以镜补史”，就是用出土铜镜及其铭文补充阜阳汉代历史，让阜阳两汉社会生活、民生百态跃然纸上，乃至鲜活生动起来。众所周知，两汉时代距今已两千多年，有关阜阳汉代社会生活的历史记载，只言片语散布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无法还原其本来面目。况且，时至今日，也无人系统描绘阜阳汉代历史，即便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阜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几位教授编著的《阜阳通史》秦汉部分，也仅列出了当时的“阜阳政局”“社会经济”及“科技与艺术”三个子目，总计不满三万字，且很多借“豫州”“汝南”之地名描写阜阳历史，不免有牵强附会之感。而《阜阳汉代铜镜研究》以镜铭书写汉代阜阳历史文化，诸如富贵文化、神仙文化、长寿文化、家族文化、相思文化、诗词文化、书法文化、宗教文化、冶金文化、酒文化等，使人对阜阳汉代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浮想联翩。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均属对古代典籍文献记载缺失和今人专题研究不足的最好补充。

关于系统性。一部严肃的学术专著如同一座高楼大厦，有坚实的基础，有宏阔的框架，有完整的封顶，有密如网格的空间设计，该专著即如此论。通览全书，《阜阳汉代铜镜研究》共分四编十五章（包括附录），总

计六十余节，可谓篇目清晰，编排有序，重点突出，首尾呼应。其中第一编第一章“阜阳汉镜发现与研究综述”不能不读，它告诉大家汉镜的种类、命名和分区分期研究概况，汉镜的社会功能和研究价值，阜阳汉镜的发现与收藏状况以及阜阳汉镜的研究价值与研究现状。特别是“阜阳汉镜的研究价值”一节读后，让人们对于阜阳汉镜产生一种神圣的敬畏之感，小小汉镜把遥远的历史与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人从现实中看到了历史的影子，实现了“古为今用”的目的和研究之初心。还有“阜阳汉镜铭文考释”一章值得反复阅读、细心品玩，如“贵富”与“富贵”——汉镜铭文中追求富贵思想的研究、“千秋万岁，延年益寿”——两汉铭文中长寿观念研究、“保二亲，利兄弟，宜孙子”——汉镜铭文中反映家族观念的研究、“长相思，勿相忘”——汉镜铭文中相思文化的研究、“大乐富贵，千秋万岁，宜酒食”——汉镜铭文中酒文化研究等，阜阳汉镜给今天人们留下的许多宝贵的文化信息，都在无声地叙说着汉代阜阳的确充满着多姿多彩的生活气息和深刻细微的文化内涵。另外，系统性的特征还表现为对阜阳汉镜的形制、纹饰和图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系统性分析研究方面。如对西汉早期镜图蟠螭纹与蟠虺纹、草叶纹、麦穗纹与花瓣纹、星云纹研究，对汉镜仙界图像如仙人类、仙禽类、神兽类、神物类系列图像研究等，使其对汉镜的研究，达到了深到底、广到边的至高境界，至少在目前的研究水平而言，阜阳汉镜研究不会留下许多遗憾。

关于创新性。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动力，创新也是一部学术专著的灵魂。纵观全书，《阜阳汉代铜镜研究》比之前的研究有三大创新点：一曰新莽镜“井田平贫”铭研究，二曰汉镜神仙思想的研究，三曰汉镜中的西王母神话研究。关于“井田平贫”铭文研究的评价前已述及，对后两者的创新评价仍引用王刚怀教授的观点，他在《汉镜文化研究·哲学篇》中指出：汉镜神仙思想的物象构成宏富庞杂，自成体系，它是汉人在神仙信仰与升仙不死说支配下营造的一个令观者无限向往的神秘世界。该研究按“仙人”“仙禽”“神兽”“神物”等分类，对镜图承载神仙思想的物象，尝试进行系统的释名释义，对神仙思想题材的汉镜铭文，进行系统的整理考释，并借此分析不同历史阶段中，汉镜神仙思想的演变特征及社会背景、时代动因，对与神仙思想相关的若干汉镜物象认读问题进行考证。与此同时，汉镜中的西王母神话题材十分丰富，该研究集中诸多材料，分析比较禽兽镜、画像镜、神兽镜图式中的西王母图像与铭文，由西汉早期初现，到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逐渐发展、流播的演变轨迹，进一步探讨了汉镜西王母神话题材兴衰衍变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动因。笔者

认为，镜图中的西王母神话题材的流播与演变，主要与汉代社会生活背景及神仙信仰与升仙不死说有关。东汉原始道教的兴起，道家“造神运动”的推波助澜，更是促成汉镜西王母神话内容题材变化的主要动因。因此，上述三大创新研究联想丰富、独树一帜，令人称奇。

玉彬人如其文。

博学多识，是他的资本。然而据我所知，史学专业、考古专业、青铜器专业并不是他的本行。大学毕业后的他，曾在文化部门所属的多个单位工作，到阜阳地区博物馆可以说是半路出家，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为阜阳文博事业奉献一生的老馆长韩自强和“文革”前毕业的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才生刘海超，两位老师对他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加之玉彬年轻好学，心有灵犀，在文博这个奇妙世界里吸取丰富营养，不仅对铜镜情有独钟，对青铜器、玉器、陶瓷等也多有体会，常有论文发表于国家文物考古类杂志，成为省内有名气的文博专家，着实令人刮目相看。

严谨敦实，是他的风格。作风严谨，是对每个治学者的基本要求，对文博工作者来说更是如此。我曾听玉彬讲述过他参加田野考古工作的经历，在一般人眼里很好玩、很开心的事，其实工作中充满了艰辛困苦，不仅要抵御严寒酷暑等自然界侵扰，而且要耐得住寂寞和诱惑，严守职业底线，做一个规规矩矩、敦厚诚实的人。

友善平和，是他的为人。玉彬与人为善，在圈子里是有目共睹的。谁家遇到什么事情，他总是有求必应。朋友之间有什么需求，他总是尽力而为，第一时间去帮助解决。包括做学问，写文章，他有了新材料、新发现，也能做到无私提供，甚至帮助提供线索。在遇到一些无谓的纷争时，他总能从大局着眼，从小事入手，耐心细致，多做解释和疏导工作。

总之，玉彬为人、为文、为事，各方面都是一个敢于担当的人，是一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信赖的人。就历史与文物研究而言，对阜阳汉镜材料做深入系统的整理和原创性研究，是一个困难重重、充满艰辛的过程，不下一番苦功夫、不付诸心血汗水、坐不住冷板凳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在当下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尤其是如此。玉彬同志工作之余能够沉下心来拿出这样一部专著，可喜可贺，不仅表明他具有扎实的理论水平、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吃苦耐劳的钻研精神，也体现了他对阜阳文博事业的无限热爱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由此亦使我们看到了阜阳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工作的希望所在，期待玉彬将来有更多的新作问世。

最后谈一点《阜阳汉代铜镜研究》一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汉镜实物材料的研究，图片与文字的对比校勘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本书给人